

書評

張 藝 曜*

方祖猷著

《王畿評傳》

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1 年，519 頁，ISBN 7-305-03585-8

方祖猷先生的《王畿評傳》，是近年來少數全面討論王畿生平與思想的專書。作者本身是浙江人，地緣上的親近，使其專治明末清初的浙東學派的學術，共著有《萬斯同年譜》（與陳訓慈先生合著）《萬斯同評傳》、《清初浙東學派論叢》等書，在學術思想史上有相當高的價值與地位。這本《王畿評傳》，則往上追溯明中期的浙東思想淵源之一——王畿。並未脫離他所素來熟悉的領域。

本書共 14 章。作者首先在第 2 章花費了六十多頁的篇幅，交代王畿一生行事與活動足跡，是全書的重心之一，也是作者花費相當心力寫作的部分。作者把王畿的一生分作四個階段：受學於王陽明時期（1521-1531）兩京居官講學時期（1532-1542）林下講學時期（1543-1566）晚年講學時期（1567-1583）。作者相當用心的把王畿文集中的各篇文字，一一找出其寫作年代、背景，再以此為基礎，敘述王畿一生的活動歷程，以及與其他學者的往來交涉。透過這些具體而詳實的描寫，不僅充分補充了目前有關王畿年譜過分簡略的不足，同時在其鋪陳勾勒中，我們可以更容易進入王畿的思想世界。

*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。

王畿向來被視為王門弟子中思想獨創性最高者之一，其思想學說自然是任何有關王畿研究的專書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。本書第3到8章分別討論王畿的「四無說」、「心體論」、「性命合一說」、「良知論」與「知行合一」等學說，不僅方便讀者更深入瞭解其思想內容，同時也總結了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。而作者通過對一手史料的精密閱讀，細膩的辨析，更提出不少獨到的見解與發現。如作者分析從王守仁到王畿的思想變化，認為王守仁的「知行合一」說在經典上難免失據，王畿則更進一步補足其師的缺陷。（頁213-218）在知行關係上二王也有不同的看法。王守仁是知行兩個概念的交叉關係，兩者並非全同，只是外延部分重合。王畿則把知行變成從屬關係，知可以包行，行不足以包知。（頁223）

一般認為王畿主張先天正心的頓悟之學，即本體為工夫，故不主張用工夫，也不提倡後天誠意之學。作者為王畿翻案，主張王畿的關懷曾有變化。最初雖倡即本體為工夫，但嘉靖四十四年與耿定向討論本體工夫問題，提出悟與修、頓與漸結合的思想，可視為一次轉折。此後王畿有對上根人說法的方式，也有對中下根人說法的方式。因此並不全否認工夫的必要性。這類對上根人說法，與對中下根人說法的分別，正是沿襲其師天泉證道的說法而來。¹

此外，作者還討論王畿思想中易學的成分。王學的興起是明代四書學流行的最高峰，但學者並非從此不讀五經。有些王學學者專擅易學，有些專擅春秋學。如羅汝芳師從胡宗正學習《易經》，由《易經》悟大學格物之說。²又如吉安府安福縣，明初以來就是春秋學的重鎮，而出身此地的江右學者鄒守益，父子都以春秋學知名。³《易經》與《春秋》，似乎是王學學者十分在乎的兩部經典。作者注意到王畿與易學之間的關係，若能更進一步放在整個王學的脈絡下討論，應可有更多發明。

第13章焦點放在良知與三教的關係，其中討論致良知與調息法、養生術

1 《傳習錄》（臺北：金楓出版社，1987），下卷，頁220-221。

2 黃宗羲，《明儒學案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7），泰州學案三．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，頁761。

3 明初劉球便擅《春秋三傳》之學。此後鄒守益之父鄒賢，也師從劉球學習《春秋》，並且成為家學。見鄒守益，壽姚君鵬序，《東廓鄒先生文集》（清刻本），卷1，頁17；《明儒學案》，江右王門學案一．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，頁335。

的關係，是相當有趣的部分。我們可以看到王畿教人如何調息，以及如何養生的言論，這些言論必須放在當時的社會文化脈絡下來看。作者初步處理了這些議題，如比較智顥的《童蒙止觀》 調和第四 與王畿 調息法 一文，發現王畿的言論完全出自前書。（頁 346-347）第 16 章作者在回顧日本學者的研究時，又更進一步引用吳震的說法，談到王畿的 調息法 的道教思想特徵，都可以在道教內丹家的著作中找到根據，甚至可以說王畿用道教思想詮釋並改造了王學。（頁 469）而王畿著作中許多具體的養生實踐，應與道教也有關係。

作者更開一章，處理王畿與同門學友之間的辯論，這是一般所未及的。書信往來，是明末士人普遍用來溝通與交換意見的方式。在王門弟子的文集中，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大量的書信往來，其中有相當豐富的資料可資利用。作者把重點放在思想的往來辯難上，使用雙方文集中的往來書信，展示了王畿與十位同門之間的言論往還，讓我們對當時的思想辯論，有更具體的、更多元的思考。而書末附錄 王畿友人弟子簡錄，也提供讀者更多背景知識的指引。

第 15、16 兩章，分別談王畿思想在中國與日本的流傳影響。中國方面，作者以李贊、周汝登、徐渭為王畿傳人，這是比較特出的部分。在黃宗羲的分類中， 泰州學案 所收人物，在地域上與思想上都無共通之處，但援佛入儒則是這些人共通的作法。作者懷疑李贊、周汝登應是王畿而非羅汝芳的傳人，不僅與學界一般對二人的定位不同，同時由於王畿思想中有更多道教的色彩，因此也可能影響到所謂泰州學派的定義。

《明儒學案》記載周汝登「供近溪像，節日必祭，事之終身」，這段記載很明顯說周汝登視羅汝芳為師，視己為其傳人，但作者認為這段文字在楊起元的傳中也有，因此可能原屬楊起元傳，但是後人抄錄誤植入。（頁 426）不過，必須注意周汝登與佛教之間的關係。而尊崇師像的作法，與禪宗祖師像的流傳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對親近佛教的周汝登而言，這類作法並非完全沒有可能。作者在這方面應作更深入的分析。

不過，從地域關係來看，周汝登在思想與淵源上更親近王畿是很可能的，而翻檢其文集，作者也成功證明了周汝登更推崇王畿而非羅汝芳。尤其周汝登只稱王畿為師，但稱羅汝芳為近溪先生，二者確有差別。（頁 424-425）

至於李贊與王、羅兩人的關係，李贊曾對焦竑說「龍溪先生全刻一字字皆解脫門」，「若近溪先生刻，不足觀也」，且曾經批點王畿的語錄抄，作者因此認為李贊敬仰的是王而非羅，也有道理。

不過，王學是否那麼強調師弟觀念，是一疑問。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王門弟子在不同時期師從不同學者，這類事例俯拾可見，不煩多引。作者也許認為師弟關係與傳人的不同，但若說李贊、周汝登、徐渭等人是王畿的傳人，總難免牽強。畢竟上下兩代之間傳法的關係不甚清楚。尤其像李贊與徐渭這類獨來獨往的人，要說兩人傳承王畿的「一脈之傳」，較難說服人。也許說三人受王畿思想較大的影響，更為妥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在最後一章特別討論王畿思想在日本的流傳影響，以及日本學界的研究概況。包括王畿思想的研究，王門流派的幾種分法，王畿與氣的哲學、佛道哲學的關係。日本學界對明代思想史的研究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，而透過作者的介紹，有利於讀者的瞭解。

本書在引用資料出處上稍有疏漏的地方。如開卷兩張王畿講學活動的地圖，除了參考譚其驥主編的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，還參考了中純夫 王畿の講學活動（《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》26號，1997年）一文，作者其實已在書末的參考書目中列出此文，但應可在當頁註腳中再註明。而所參考的王畿年譜，也應註明。頁35、113西元紀年的部分，則在排版上有一點小錯誤。

作者本身是一位用功甚勤的學者，這樣一本評傳類的書籍，並不是簡單抄撮一些資料剪輯而成，而是通過對王畿的文集以及其他一手資料的深沈浸潤，精密研究，而得到許多個人獨到的眼光與見解，這些見解都很有參考價值。因此整本書在質量上與深度上，都很有可觀之處。這也是本書特別值得推薦的地方。